

中国现代文学史

1917—2000

(下)

ZHONGGUO XIANDAI WENXUESHI



朱栋霖 朱晓进 龙泉明 主编

以「人」的观念嬗演中国现代文学史进程

重新遴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经典

重新阐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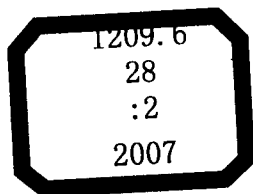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文学史

1917—2000 (下)

ZHONGGUO XIANDAI WENXUESHI



朱栋霖 朱晓进 龙泉明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史 1917—2000(下)/朱栋霖,朱晓进,龙泉明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

ISBN 978-7-301-11203-8

I. 中… II. ①朱…②朱…③龙… III. 现代文学 - 文学史 - 中国 -
1917—2000 - 高等学校 - 教材 IV. 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9028 号

书 名: 中国现代文学史 1917—2000(下)

著作责任者: 朱栋霖 朱晓进 龙泉明 主编

责任编辑: 张雅秋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1203-8/I·083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21.5 印张 380 千字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目
录

下 册

- 第一章 1949—1976 文学思潮/1
- 第一节 五六十年代文学思潮/2
 - 第二节 “文革”文学思潮/16
- 第二章 五六十年代小说/23
- 第一节 五六十年代小说概述/23
 - 第二节 柳青 梁斌 杨沫等/28
 - 第三节 另一种探索/33
- 第三章 五六十年代诗歌戏剧散文/40
- 第一节 五六十年代诗歌概述/40
 - 第二节 五六十年代戏剧概述 《茶馆》等/46
 - 第三节 五六十年代散文概述/62
- 第四章 本时期台港文学(一)/70
- 第一节 台湾文学概述/70
 - 第二节 小说 白先勇等/74
 - 第三节 香港文学 刘以鬯等/84
 - 第四节 通俗小说 金庸等/89
- 第五章 本时期台港文学(二)/101
- 第一节 新诗 余光中 郑愁予等/101
 - 第二节 戏剧 姚一葦等/105
 - 第三节 散文 梁实秋等/109
- 文学大事记(1949—1976)/117
- 第六章 1977—1989 文学思潮/135
- 第一节 新时期文学初期文艺复苏/135
 - 第二节 80年代前期文学思潮/139

目 录

- 第三节 80年代后期文学思潮/143
- 第七章 80年代小说/149
 - 第一节 80年代小说概述/149
 - 第二节 王蒙 湛容 张贤亮等/162
 - 第三节 汪曾祺 贾平凹/179
 - 第四节 莫言 马原/186
- 第八章 80年代诗歌/195
 - 第一节 80年代诗歌概述/195
 - 第二节 朦胧诗/200
- 第九章 80年代戏剧/206
 - 第一节 80年代戏剧概述/206
 - 第二节 探索戏剧/212
- 第十章 80年代散文/219
 - 第一节 80年代散文概述/219
 - 第二节 报告文学/222
- 第十一章 80年代台港文学/226
 - 第一节 小说/226
 - 第二节 戏剧/235
 - 第二节 散文/239
- 文学大事记(1977—1989)/244
- 第十二章 90年代文学思潮/254
 - 第一节 90年代文学转型/254
 - 第二节 后现代主义与探索中的新思潮/257
 - 第三节 关注人文精神及其文化思潮/265
 - 第四节 女性主义文学思潮/269
- 第十三章 90年代小说/273
 - 第一节 90年代小说概述/273

目 录

- 第二节 新写实小说 刘震云等/286
- 第三节 新历史小说 陈忠实等/291
- 第四节 女性写作 王安忆 陈染等/295
- 第五节 转型期先锋小说 余华等/300
- 第六节 文化道德小说 张承志等/306
- 第七节 其他/312
- 第十四章 90年代诗歌/320
- 第十五章 90年代散文/324
- 文学大事记(1990—2000)/332

- 后 记/337

第一章

1949—1976 文学思潮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社会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后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政体,是20世纪后半期中国社会的根本性质。这一社会环境与社会性质决定了20世纪的中国当代文学同发源于五四的中国新文学——现代文学相比,已经进入到一个不同的政治文化环境与生存环境。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农村土地改革、肃反、“三反五反”、抗美援朝、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国民经济恢复,到声势浩大的反右派运动、大跃进运动乃至历时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生的共和国执政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实施了一系列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新政权战略措施与工作。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大震荡、大变化、大发展,都对当代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本书将通常所说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这两个历史时期的文学统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并以历史年份标示本书叙述的起迄。正如我们在全书开首提出的,“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在20世纪持续获得现代性的长期、复杂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一长期、复杂的过程,既指1949年之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阶段,也包括1949年至今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曲折起伏过程。而1949—1976年间的中国文学,包括十七年文学(1949—1966)和“文革”文学(1966—1976)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当然有许多不同,就文学思潮的发展历程和理论状况而言,又表现出诸多的一致性。它们都强调文学的无产阶级与社会主义性质,都把文艺服务于现实政治、配合国家意识形态作为文学的基本目的,重视文学或审美的革命功能和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作用。在这一阶段里,国家意识形态一直坚持不懈地在对文学的各种因素进行体制化的规范与整合,文学的组织化、体制化成为文学生产的基本形式,文学批评也一直扮演着规范、整肃、指导整个文学创作和确立文学发展方向的角色,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及其在各

省市的分级机构(包括《文艺报》等理论批评刊物)以体制化的方式对这一指导、规范起着组织保证作用。文学创作也都逐步确立了一系列规范,随之呈现出大致相同的表现形式与美学风貌。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一统化阶段。

第一节 五六十年代文学思潮

1949—1966年的十七年文学,作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文学阶段,在文学思潮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表现为鲜明的统一化和一元化状态。建国以后时代性质的社会主义转型,从根本上为文学艺术的发展确定了政治方向和文化要求。在新的时代看来,社会历史的不同性质的交替,不仅意味着人民生活的进步与新生,同时也意味着文化发展在阶级属性上的某种中断和面临的新的起点。为此,文艺思想的全面置换、更新就成为首要的任务。十七年文学阶段里,文学思潮发展必须在两个前提的确立中进行:首先是确立以《讲话》精神为主体内容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地位;其次是对已有的各种各样的历史形态的旧有美学观念进行清理。

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北平举行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会议由郭沫若提议召开,出席代表824人(包括列席代表)。毛泽东到会讲话,朱德致贺词,周恩来作政治报告。会议由郭沫若作《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周扬总结解放区文艺运动,作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茅盾总结国统区文艺运动,作题为《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会议成立了以郭沫若为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的全国文艺界的组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文联)。会后又接着成立其下属的各个协会。其中,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为中国作协),选举茅盾为主席,丁玲、柯仲平为副主席。

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是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两支文艺队伍大会师的盛会,标志着中国新文学以此为起点,进入了当代文学的阶段。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于,根据毛泽东文艺思想总结了五四以来新文艺工作的成绩与经验,确定了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总方针,指出了建国以后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向,提出了社会主义时期文艺的新任务。“新的人民的文艺”的理念被明确命名。^①这就为中

^①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

国当代文学确定了方向。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它需要面对与传承三个文学传统与资源:五四新文学传统与资源、30年代文学传统与资源、延安工农兵文学传统与资源。第一次文代会确认:“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一定是错误的方向。”^①郭沫若明确地把五四以来的文艺发展概括为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一条是代表软弱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路线,一条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人民的为人民而艺术的路线。”斗争的结果证明:“任何文艺工作者如果不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他的努力就毫无结果。”^②茅盾的报告用《讲话》精神对国统区文学进行了重新叙述,检讨国统区文学的问题,其根本的原因是“未经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生活思想各方面和劳动人民是有距离的”,并把“争取进步、改造自己”作为国统区作家的努力目标。^③这两个报告已经显示出,来自两个不同区域的文艺、作家队伍有着不同的性质和政治地位。三种文学传统与资源在新的时代政治语境中面临重新定位。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发表以后,解放区所形成的延安艺术理念,就开始了对外包括国统区文艺在内的各个领域的影响与渗透,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以服务人民政治和表现工农兵为核心的延安工农兵文学理念已表现出对全国文艺界混乱局面的清肃趋势。在本时期的文学思潮发展过程中,《讲话》所阐释的延安工农兵文学理念在不断的完善中被强化与泛化。整个50年代的文学行为,呈现为对创建文学新格局、新规范、新秩序的努力。有关文学或艺术问题的讨论开始向革命性批判层面推进。创建文学新格局、新规范、新秩序,既表现为对当下及未来文学发展的规划,也需要重视对已有的一切文学历史存在的清理与价值的重新确认。在十七年文学发展过程中,那些连续不断的、各种各样的、大小不一的关乎文学的批判,都从清理和重建两个方面呈现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生成过程和发展轨迹。

政治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在本时期上升为文学与所有外部关系中最重

①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

② 郭沫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同上。

③ 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报告提纲》,同上。

要的问题。文学与时代政治的紧密关系,文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是十七年文学思潮的主要特点,也是十七年文学理论体系建构的理论基点与实际目的。根据毛泽东的观点:“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① 强调文学的阶级属性和政治性,强调文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学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服务。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无产阶级的党的文学的原则”,明确了文学事业与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关系与位置,“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事业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整个党的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② 十七年文学中连续不断的批判、斗争,就是不断强化文学为时代政治服务的集中体现。同时,经过一次次的政治运动,被强化了文学为时代政治服务的要求,很快成为文学思潮的主流观点,也成为中国文艺界的共识。

十七年中国文学运动的全面政治化、阶级斗争化,也源于对新中国建国初年国内政治与社会态势的估计。早在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就在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1949年3月)提出:“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③ 1957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的两次重要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④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毛泽东进而

①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2页,1966年版。

② 同上。

③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7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④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1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提出：“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① 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②

十七年文学思潮的发展过程，首先体现在一系列的文艺运动——批判、斗争——的交替更移中。这个过程，既是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建构的实际步骤，也是确立文学新规范、新秩序的重要部分。文艺界的批判、斗争，都是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指导下，在文艺一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的连续不断的斗争。当然每一次运动的政治指向又各有所侧重。

一 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1950年年底，摄制、完成于建国前后的历史传记影片《武训传》开始在全国公映。剧中的武训是清末民初一位行乞兴学的历史人物。编导孙瑜接受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提议，将武训事迹改编成电影，作者认为武训的行为“反映了旧社会贫苦农民文化翻身的要求”^③，有利于新时代的文化建设和发展教育事业；因而影片歌颂了“武训精神”。影片公映后，京津沪等地报刊发表不少赞扬文章。但不久《文艺报》发表贾霁的《不足为训的武训》^④，对武训形象及其称赞者提出尖锐批评，并重新刊载鲁迅杂文《难答的问题》。紧接着《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1951年5月20日），使得对《武训传》的讨论骤然变为批判。这篇由毛泽东撰改的社论指出：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卑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

①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7、418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② 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转引自《红旗》1967年第9期。

③ 孙瑜：《编导〈武训传〉记》，《光明日报》1951年2月26日。

④ 贾霁：《不足为训的武训》，《文艺报》1951年4卷1期。

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①

社论一发表,全国舆论界立即以此为定论,一致批判影片《武训传》的“反动性”,扣以宣扬唯心主义、改良主义、个人主义、阶级投降、奴才思想、歪曲历史、诬蔑农民革命、掩盖阶级矛盾等各种政治帽子,形成一场全国范围的大批判运动。编导孙瑜、主演赵丹以及称许者,数十人被公开点名批评,他们不得不违心地作出检讨。周扬发表了《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 and 反现实主义的艺术》作为小结。毛泽东在社论中提出的所谓“根本性的问题”,就是要求文艺必须以阶级观念评价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文艺作品所反映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真实性”,并不由历史本身决定,而必须以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价值与标准予以重新厘定。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进一步强调了新中国文艺将以政治标准评判艺术问题。这次批判开启了名为讨论、实为政治批判的新中国文艺运动的先河。从一部作品生发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倾向,然后通过对此进行大规模的批判,以群体参与的运动方式确立某种新的理念——这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思潮生成、泛化的基本方式

^① 毛泽东:《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47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二 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清算胡适派“唯心论”思想

俞平伯致力于《红楼梦》研究，是继胡适之后的“新红学派”的代表人物，20年代出版了《红楼梦辨》，对《红楼梦》及其作者、小说的艺术成就做出了独到的研究。解放后他将其删改增订，易名为《红楼梦研究》，于1952年出版。1954年俞平伯又发表《红楼梦简论》一文，扼要总结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涉及到《红楼梦》的作者、版本、传统性、独创性，以及作者与书中人物的关系等命题。1954年，李希凡、蓝翎在《文史哲》（1954年第9期）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批评俞平伯的研究观点和方法。嗣后，《光明日报》（1954年10月10日）又发表了他们的《评〈红楼梦研究〉》。李希凡、蓝翎认为俞平伯从主观唯心论出发，以反现实主义的观念，因袭旧红学家们所采取的脱离社会和形式主义的考证方法，将小说内容归结为“色”、“空”观念，“怨而不怒”的风格，曲解了作者的创作方法，“否认《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把《红楼梦》歪曲成为一部自然主义的写生的作品”。^①这一情况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与干预。他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指出：

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将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反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②

^① 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文史哲》1954年第9期；《评〈红楼梦研究〉》，《光明日报》1954年10月10日。

^② 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34—135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把《红楼梦研究》问题^①与“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联系起来,这就把学术问题论争激化为政治思想斗争。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连续8次召开联席扩大会议,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中国作协主席茅盾作了发言,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作了《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就《红楼梦》研究中的所谓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倾向和《文艺报》在此问题上的错误进行讨论和批评。会议还作出了改组《文艺报》领导机构的决议,撤销冯雪峰的主编职务。这场运动和斗争,从对俞平伯的批判深入到对五四以来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胡适思想及其影响的批判,由学术探讨扩大到政治问题,由古典文学研究扩大到社会意识形态问题,由文学研究领域扩大到思想、文化领域乃至整个学术界,意在清除五四以来所谓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这表明,时代政治对文化进行改造的对象范畴,已由当下创作领域拓展到学术研究领域,对于历史遗产进行“批判地继承”,必须以唯物主义的阶级论为依据。在那时,一切学术问题都是政治问题。

三 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及其文艺思想

建国以后,作为共和国最高政治领袖的毛泽东,始终把文艺工作作为一项政治斗争。1955年由他亲自发动的对胡风集团及其文艺思想的斗争,就是在文化改造中实施这一战略的重要步骤,意在清除来自内部的异己者的声音。从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开始直至建国后,胡风一贯以独立的文艺理论家姿态活跃于文坛。他的文艺思想丰富而复杂,尤其对现实主义有自己独到的认识,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他倡扬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强调主体对客观的“熔铸”与“拥入”;提倡对人物“精神奴役的创伤”进行深度表现;认为现实主义的关键是创作方法大于世界观等,这些都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存在着歧见。早在40年代,文艺界就曾对此进行过论争。1952年文艺整风期间,《人民日报》(6月8日)转载胡风派成员舒芜的

^① 批判者依托被重新界定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概念,集中批判了胡适派“新红学”的三个方面:第一,建立在“自然主义”和“唯心论”基础之上的自传说,认为把《红楼梦》主题确认为是作者感叹自己身世的“情场忏悔”的观点,抹煞了它的表现现实的反封建社会意义。第二,“新红学”所强调的《红楼梦》的色、空观念,是想掩盖这部作品所透示出的对于封建道统和封建统治者的尖锐批判性质。第三,认为俞平伯对《红楼梦》总体风格“怨而不怒”的概括,否认了作品对中国文学战斗性传统相继承的一面,贬低了它的价值。

检讨文章^①，年底召开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帮助胡风清算其理论上的错误。《文艺报》(1953年第2期、第3期)发表林默涵、何其芳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批判。胡风不服，向党中央递交了长达30万言的《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1954年7月)，全面阐述了自己的文艺观点，一一反驳林、何等人对他的批评，提出了改进文艺组织领导方式的意见和改革文艺工作的建议。^② 1955年1月，《人民日报》开始批判胡风观点，毛泽东决定公开发表胡风的报告。中国作协主席团决定对胡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进行批判，文艺界许多人士纷纷撰文批判胡风文艺思想。^③ 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编者按语^④，公布了由舒芜交出的一些信件，定名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并附刊胡风《我的自我批判》。6月10日，《人民日报》公布《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正式将胡风等人定性为“反革命集团”，在全国掀起了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胡风及其同仁被捕入狱，2100人受到株连，造成建国以来罕见的冤假错案。这一“斗争”，从一开始就把胡风及其他同仁置于阶级的敌对位置，把文艺思想提升为为阶级的和政治的问题。

四 “双百”方针与反右派运动

1956年，作为新的文化政策，“双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和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是50年代中国的两个重要事件——这是两起有着内在联系的、关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整体命运的历史事件。两个事件在表面上的巨大差异及其内在关联，寓示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与时代政治文化之间复杂而又紧张的关系。一方面，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基于对社会主义信念的恪守，在不断地追寻与时代的和谐一致，力求以主人公的姿态参与到

① 舒芜：《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原载《长江日报》1952年5月25日。

② 其中包括胡风批评文艺界在有关共产主义世界观、工农兵生活、思想改造、民族形式、题材等5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将它们说成“五把刀子”。

③ 郭沫若：《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人民日报》1955年4月1日。茅盾：《必须彻底地全面地展开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文艺报》1955年第5号。邵荃麟：《胡风的唯心主义世界观》，《人民日报》1955年3月20日。蔡仪：《批判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文艺思想》，《文艺报》1955年第3号。秦兆阳：《论胡风的“一个基本问题”》，《文艺报》1955年第4号。李希凡、蓝翎：《胡风在文学传统问题上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新华月报》1955年3月号。

④ 毛泽东：《〈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60—167页。

新时代的文化建设之中,因而对自我的改造日益朝着自觉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建国以后不断的针对知识分子的批判运动,又在加深着知识分子的不安情绪。1956年,随着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全国工作的重心开始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在思想文化领域,需要发扬民主,纠正“左”倾思想的影响,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向文艺界、科学界人士,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对这一方针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但这一方针不是抽象的、无原则的,“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是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要加强它的这种地位”。毛泽东进而提出了辨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①

“双百”方针的提出,曾在一个时期缓解了时代政治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紧张关系。知识分子所渴求的文化自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文艺界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松动与转机,尤其是文学理论领域包括对于“人”的思考也出现一些有限的探索:《写真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生命核心》(刘绍棠)、《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何直)、《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陈涌)、《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周勃)、《要不要“干预生活”》(晨风)、《话剧演员要求创作民主》(方焰)、《解除文艺批评的百般顾虑》(黄药眠)、《文艺刊物需要“个性解放”》(李汗)、《烦琐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唐挚)、《论人情与人性》(王淑明)、《刺在哪里?》(秋耘)、《“探求者”文学月刊社启事》、《我对当前文艺界问题的一些浅见》(刘绍棠)、《论“文学是人学”》(钱谷融)、《不能没有自由讨论》(安旗)、《电影的锣鼓》(钟惦棐)、《论人情》(巴人)等一批文论,表达了对诸如现实主义真实性、典型性、文艺创作中的人情与人性、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文艺生产规律与领导体制、歌颂与暴露以及人物性格的塑造等多方面问题的兴趣与论争。就当时的文学理论和批评而言,上述这些本应属于文学艺术常识的“不是问题的问题”,在当时被真诚而热烈地争辩着。在文学创作方面,也初步露出活跃的苗头,出现了两类新颖的作品。一类是直面现实矛盾,大胆“干预生活”,突破了长期以来只准歌颂不准暴露的禁区,有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原名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时改为此名)、李国文的《改选》、刘绍棠的《田野落霞》、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8、391、393页。

耿简的《爬在旗杆上的人》、李准的《灰色的帐篷》、南丁的《科长》、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等。另一类是突破被长期封锁的人情、人性的禁区,把笔触伸向人物丰富复杂的情感世界,克服公式化、概念化的弊端,有邓友梅的《在悬崖上》、李威伦的《幸福》、丰村的《美丽》、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宗璞的《红豆》等小说,以及杨履方的《布谷鸟又叫了》等话剧。这些在文学理论和创作领域共同显示了文学领域的“早春天气”。

但这种情形为时不长,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并接连发表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号召“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①,反右派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这一场阶级斗争,指向包括文艺领域在内的知识分子队伍及具有知识分子性的人群。全国先后有56万人被定性为政治上的右派,成为新时代里无产阶级的“新的敌人”。文艺领域的右派定性,是与他们在“双百”情势下的“出格”言论与创作联系在一起,当然也与他们的“历史作为”联系在一起(像丁玲、冯雪峰、艾青等)。被打成右派的,有冯雪峰、丁玲、陈企霞、艾青、吴祖光、钟惦棐、傅雷、陈梦家、孙大雨、穆旦等一批老作家,有王蒙、刘绍棠、丛维熙、张贤亮、高晓声、流沙河等文坛新秀;他们接受批判斗争,被开除公职,下放劳动改造。中国作协于1957年7—9月连续召开25次党组扩大会议,揪出与痛批“丁陈反党集团”(包括冯雪峰);周扬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1958年2月28日),对文艺界的反右斗争作了总结。当初在“双百”方针鼓励下出现的一些探索性的作品和文艺观点,也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修正主义文艺理论”。《文艺报》开辟“再批判”专栏(1958年第2期),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编者按语,重新发表王实味、丁玲、萧军、罗烽、艾青等写于延安时期的《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论同志之“爱”与“耐”》、《还是杂文时代》等作品,进行再批判。

五 60年代的文艺批判

反右运动之后至1965年,疾风暴雨式的大斗争运动虽然没有出现,但

^① 毛泽东在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后发制人”这一思想,后又称这是“引蛇出洞”,是“阳谋”。5月4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5月15日起草《事情正在起变化》;6月8日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5、423—429、431—433页。